

英雄人物塑造的审美经验

黎 山 晓

无论是在风雨如磐的年代,还是在春意盎然的今天,“五四”以来的中国史,既可说是一部群众的觉醒史,也可说是一部英雄的成长史。正是英雄人物和广大群众的长期奋斗,才使历史的蹙眉绽开了胜利的笑靥,民族的血泪化为了东方的霞霓。我们的英雄人物,不仅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发挥了骨干、支柱和桥梁作用,而且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上,推动了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早在半个世纪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根据时代特点和群众需要,就提出了文艺应该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要求。一九五五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又说:“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我们的当代文学在塑造英雄人物特别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方面,虽还存在这种或那种不足,但在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可称之为继往开来的重要经验。现略述之,以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参照。

一、党和人民的事业是英雄人物的生命

党和人民的事业,对于英雄人物来说,

并不是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是他们真善美相结合的生命之所在。英雄人物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态度,并不仅仅是自己的理性对于客观规律的真的把握,也不仅仅是自己的意志对于实践活动的善的选择,同时还是自己的情感对于人生境界的美的体验。没有理性的认识,是不能把握真理的;没有意志的力量,是不能参与实践的;但是,理性认识和实践意志若不转化为情感需要和情感体验,党和人民的事业也就不可能真正地成为英雄人物的生命。

这里,以《青春之歌》一例来作一点正面说明。当共产党员卢嘉川交给林道静一些革命宣传品时,林道静不仅产生了认识和意志活动,同时还随之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情感体验:“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半旧的古铜色的小提包,好象母亲接抱自己初生的婴儿。顷刻间,她的心头充溢着一种幸福的、欢乐的感情,这感情是这样激越和有力,竟使得她忘掉了刚才的紧张,紧紧把提包搂抱在怀里。”林道静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理性认识和实践意志,正是因为转化为了这样一种诚挚、深厚的情感需要和情感体验,才获得了义无反顾地踏上革命征途的牢固基础。

生发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的英雄人物的情感需要和情感体验,既是一种社会化的生命本能,又是一种推动英雄人物为革命献

身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红岩》中关在“中美合作所”的许云峰，本来有一条暗道可以逃走，但他为了难友以后能从此越狱，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暴露这一秘密。越狱中，齐晓轩主动用伤残的自身吸引敌人的火力，以一死换众生，而不愿只身苟活。许云峰、齐晓轩这样作，并无谁强迫他们，而是出乎自身内在的指令，出于保存他人、保存整体的情感需要和情感体验，出于他们生命本性的自然而然的显现。又如，当王杰扑向在人群中即将爆炸的炸药包的时候，当欧阳海在飞驰而来的火车面前推开拦道的战马的时候，当第一军医大学学员接住华山掉下的游人的时候，并没有来一番思想斗争，也没有来一番逻辑推论，而是在分秒必争的瞬间，以出乎生命本性的敏捷动作完成了他们的英雄行为。以整个生命推动着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的英雄，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二、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民族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本身不是共产主义思想，但是可以成为通往共产主义思想高峰的中介和桥梁。旧社会许多人同情革命、倾向革命以至投入革命的最初的思想基础，或者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或者是不甘剥削的反抗精神，或者是铲除私有的大同理想，或者是几方面兼而有之。

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人类最高级、最美好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和其他思想体系存在不可混淆的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又是全人类各民族一切优秀思想、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共产主义思想的后一方面特点说明，包括爱国主义、反抗精神和大同理想在内的民族优秀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并非是绝缘的，而是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存在着某种继承、发展和提高的联系。所以，爱国主义、反抗精神和大同理想等民族优秀精神，可以成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中介条件。正因为如此，

在反复探索和多方比较中，许多原来并非共产主义者的人们，找到了通向共产主义者的道路。

当代文学作品中这类典型的例子很多。《红色娘子军》中的主角吴琼花对于地主的压迫剥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抗精神。究其实质，这还只是农民个人自发的反抗精神，和以彻底铲除全部剥削制度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反抗精神相比，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在反对私有者的压迫剥削的这一点上，确又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方才能转化为另一方，否则，这种转化就无实现的可能。吴琼花的个人反抗精神之所以能在革命实践中改造、升华为无产阶级的反抗精神，就是以二者的内在联系为前提的。民族优秀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之间存在内在的血肉联系这一点说明，只有具有民族优秀精神的人，才有可能在民族生活的殿堂中，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吴琼花的成长是如此，朱老忠又何尝不是如此。广而言之，一切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成长也无不如此。

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优秀精神的结合，鲜明地体现于英雄人物的身上。这在《高山下的花环》争带尖刀排的场面中，有一非常感人的表现。当梁三喜刚一提出由他带的时候，就被靳开来喝住，认为梁绝对没有资格。他说：“我靳开来兄弟四个，死我一个，我老父老母还有仨儿子去养老送终……唯独你，如果有个万一……你那白发老母亲，还有韩玉秀怎么办？”在这里，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孝敬父母的民族美德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感动得梁三喜连忙摆手，声音发抖地叫他别说了。《红日》中的军级干部沈振新对干部战士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这既是无产阶级深厚情谊的显现，同时又是重群体、重和谐、重人际关系和人伦情感的民族传统的发扬。英雄人物身上这种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优秀精神的结合，即使共产主义思想获得普遍认同的民

族特征，同时又使民族优秀精神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优秀精神于英雄之身的结合，一方面说明共产主义思想并非如有人主观臆断的是20世纪失败了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的思想，而是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和结果的，当代最先进也最富于生命活力的精神之花；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民族传统除了有其封闭性和保守性的一面外，还有其开放性和创造性的另一面。如果否定这后一方面，我们民族传统就不可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且实现二者水乳交融的结合，从而形成富有时代朝气的新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

三、崇高和多样性美的结合

崇高，是在严重斗争中所显现出来的人这一实践主体的伟大、顽强的力量。这不是非理性的疯狂，也不是无目的的骁勇。无产阶级英雄的崇高，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忠诚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主义精神，不屈于敌人和困难的英雄主义气概。这种激荡人心的崇高美，作为英雄人物的主调，是英雄人物所以是英雄人物的关键所在。不突出这一点，就不能写好英雄人物。

但是，崇高美并非孤立自在的。它作为美的凝焦和升华，作为美的最高层次和最高境界，其产生和形成有其非常深厚的基础。许多年过去了，许多记忆淡忘乃至消失了，而《百合花》中的小通讯员的形象，经过时间流水的洗涤，愈益显得鲜活和感人。当敌人的手榴弹在挤成一堆的担架队员的人缝里冒烟的时候，我们那位年仅19的小通讯员一边叫别人快趴下，而自己却毫不犹豫地扑在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上。这一崇高的行为，闪光的时刻只有那非常短暂的几秒。但这光华耀目的几秒，却来自通讯员一生的积累和孕育，来自一切美的凝聚和升华。难能可贵的

是，茹志鹃非常精炼非常生动地显现了这一美的凝聚和升华的过程。十八九岁的年龄，是一个正在开花的年龄，也是一个对女性特别敏感，将女性奉为女神的年龄。小说生动地写出了通讯员在女性面前羞涩、侷促和笨拙的窘态，同时也写出了他对女性的关切和体贴的那种没有爱情的爱情。这种对女性的情感，既是对女性又是超越了女性，是对人和人的生活的良好的情感和美好的想象。热爱人，热爱生活的人，对于人的对象性存在的自然美，当然也在他的视野之中、情感之内和钟爱之列。请看，通讯员“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的插了几根树枝”，后来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热爱生活，热爱自然，这是有别于崇高的其他形态的美，但是这些崇高之外的其他形态的美，又是产生崇高美必不可少的基础，孕育崇高美不可缺少的摇篮。我们不能想象，对生活没有激情，对自然没有挚爱的人，会对祖国和人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一种九死而不改其初衷的炽烈的情感。当然，热爱生活和自然的人，不一定会具有崇高美，但具有崇高美的人，一定会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所以，崇高美虽然有别于其他层次、其他形态的美，但又必然以后者为其生发的基础，并将之整合于自身之中。因此，崇高美不是那种初级层次和单一形态的美，而是高级层次和复合形态的美。

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英雄人物是十分重要的。以往有些作品描写英雄人物，只知道一味地突出崇高美，结果将其搞成孤兀的、封闭的东西，割断了崇高美和其他形态美的内在的血肉联系。这种模式的英雄人物，一切丰富的人性、复杂的人情都一刀两断了，一个心眼只知道工作没日夜、劳动连轴转、战斗往前冲，而不知道如火如荼的斗争和如花似霞的生活的联系，金戈铁马和鸟语花香的联系，即不知道工作、劳动、战斗和广大群众多方面生活、多方面情趣的联系。这种英雄的崇高美，实际上被孤立了、抽象了、

简单化了，从而也就割断了英雄素质和丰富人性的联系，亦即割断了英雄形象和千姿百态的生活的联系。

从一定意义来说，崇高美和多样性美的统一，与阶级性和共同人性的统一是有联系的。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这段话至少说明了四个重要问题：第一，一切人性都是具体的；第二，在阶级性和人性之间不能划等号，因此只是说“带着阶级性的人性”；第三，阶级社会的具体人性中，必然包含着阶级性，不能将阶级性排除于人性的结构之外。第四，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和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人性是相通的。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是最合乎人性的，是人性的最美之花。

如果说，没落阶级的阶级性，是与历史进程相逆向，与人类绝大多数利益相分离，与共同人性相排斥的话，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则是与历史进程相一致，与人类绝大多数利益相吻合，与共同人性相沟通的。正因为如此，在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身上，不仅其阶级性旗帜鲜明，而且其共同人性丰富多彩，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最近我看了三集电视片《陪都新闻》，它描了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的历史片断，其中相当生动地描写了周恩来的形象。不仅写出了他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的大智大勇，而且写出了他的友人之思、亲人之恋、山水之情、生活之趣，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人类共同人性的结合，体现了崇高美和多样美的结合。这种结合所显现的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既是崇高的、美好的，又是多样的、广阔的。

四、角色及其冲突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任何一个现实的人，并非只有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也并非只有一种角色身份。真实的英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并非只是作为英雄人物这一角色身份而存在，他是多种角色的“角色丛”（或称“角色集”）。例如中篇小说《射天狼》中的袁翰，他既是一位军人、一位连长，同时又是一个弱女子的丈夫、两个女儿的父亲。作为军人这个角色，要求他坚守保卫祖国的岗位；作为连长这个角色，要求他履行自己的职责，带好自己的连队；而作为丈夫这个角色，则要求给自己的弱妻以体贴和照顾；作为父亲这个角色，更要求给女儿以保护和爱抚。但是在同一时空条件下，袁翰显然是不能同时实现各别角色的期待的。因为各种角色期待在同一时空条件中产生的矛盾冲突，是难以调和的。他可以作一个好军人、好连长，但他不能同时作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于是，袁翰身上各种角色期待的客观冲突，便显现为袁翰心理的主观矛盾。他的兢兢业业的工作，虽使一个后进连队赶上来，在军事训练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他又想着有愧于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总想转业回家的念头，时不时冒出来。

在人的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中，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同样，在由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决定的多种角色身份中，也有一个是主要的。而将什么样的角色身份放在主要的地位上，与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很有关系的。对袁翰来说，虽然他有时将丈夫和父亲的角色身份摆在首位，借探亲之机，超假20天来照顾自己的家庭，但从总体来看，他是自觉自愿将军人和连长这一角色放在首要和主要地位的。在他两个女儿病危的时候，他的训练工作正紧，无法抽身回家，只能将仅有的13元钱寄去。而当大女病亡后，他也只有用不停的工作，来冲淡内心的痛

苦。将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首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己的妻子、女儿是无足轻重的，是可从情感世界中轻易逐出的。如果这样写，那又是对英雄人物的歪曲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自己的亲人、朋友，也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对于他们的关切和照顾，理应包括在热爱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因此，袁翰身上体现的军人、连长同丈夫、父亲之间的角色冲突，虽从局部来说，从共时态来说，是难以两全的；但从整体来说，从历时态来说，又是统一的。“亲人哪，为了你们，我才离开你们”，这就是袁翰解决角色冲突的原则。这一原则和几十年来的党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和坎坎坷坷，我始终难以忘怀王愿坚《党费》中的一个细节。在主力红军北上抗日之后，白匪疯狂反扑的日子里，食盐显得非常珍贵。地下党员黄新收集几个党员家的咸菜，作为上缴的党费。这时，她的多日未沾盐的孩子，瞅空抓了一根腌豆角，直往嘴里填。既疼爱孩子，又忠于革命的黄新，瞅了瞅瘦弱的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不多的咸菜，忙伸手把那根豆角夺下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此刻黄新身上的党员角色和母亲角色，从一时来说，是难以两全其美的；但从长期来说，又是根本一致的。这正如黄新说的：“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共产党员也是一个普通人，也有普通人所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角色身份，以及各种角色规范、角色行为、角色态度和角色情感，自然也有不同的角色冲突。如果说共产党员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的话，就在于他们处理角色冲突时，视野更广阔，境界更高尚。

在描写英雄人物角色身份的问题上，先后发生过两种偏向。一是只描写他们出色的工作、劳动和战斗，只描写他们的单一身份和单一角色。突出这一点，当然是很重要的，否则英雄人物就不成其为英雄人物了。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真实的人、感性的人决非只有一种身份和一种角色，而是多

种身份和多种角色的集合。所以若将英雄人物的主要身份和主要角色孤立化，也就脱离现实生活了。

描写英雄人物角色身份的另一种偏向，就是只注意描写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及其复杂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当然，这对于开拓英雄人物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是大有助益的。但是，不能用一种片面性去反对另一种片面性。因此，不能用对于英雄人物复杂身份和复杂角色的描写，去淡化以至淹没英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的身份，模糊以至消失英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的本色。上述两种偏向，在一个问题上又殊途而同归，即将英雄人物的主要身份和其他身份、主要角色和其他角色的内在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置于互不相容的绝对化的对立之中，从而将英雄人物歪曲为片面的人和抽象的人。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则就易从一个偏向滑向另一个偏向。

五、个体和整体

正确处理个体和整体的关系，是塑造英雄人物的重要经验。

整体是高于个体的。《红岩》中的许云峰突遇特务包围的时候，为使市委书记得以安全转移，他主动将特务搜寻的目光引向自己。《董存瑞》中的董存瑞为了隆化的解放，他和战友争当战斗中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爆破队长。我们的英雄人物具有如此自觉的牺牲精神，在于他们认识到，只有有了整体的解放，才会有个体的解放。特别在民族危机或阶级压迫十分严重的年代，整体高于个体的问题更为突出。不首先解决民族解放或阶级解放的问题，个人解放就无从谈起。在由战争转入建设的和平年代，国家的、社会的整体利益仍需摆在首位。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绝大多数个体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电视剧《铁

人》中的王进喜，《焦裕禄》中的焦裕禄，都是坚持整体高于个体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突出代表。

当然，对于整体高于个体的观点，须作历史主义的分析。例如高于个体的封建主义整体，就是不应盲目加以肯定的。因为封建主义整体是奴役大多数个体的外在力量和异己力量，它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从本质而言是一种对抗关系。而社会主义整体虽也高于个体，但它内在包含着绝大多数个体的利益和要求，是绝大多数个体的自由联合体。因此，社会主义整体的高于个体，是在作为个体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意义上的高于个体。换言之，社会主义整体只有高于个体，才能为绝大多数个体的发展提供客观的条件。因此，将社会主义整体置于首位，是个体发展的客观需要，这种客观需要反映在个体的主观上，就是乐于为整体奉献以至于牺牲的崇高精神。

个体为整体的奉献和牺牲，是否是个性的沦丧和主体性的失落呢？对于这一问题，也要作具体的分析。正如我们并不盲目肯定任何整体一样，也不盲目肯定任何为整体的奉献和牺牲。例如奴隶奉献的整体对象（其实只是代表少数人利益和意志的虚幻的整体），并非真正体现自身利益和需要的对象，而是外于己、异于己，即和他们相敌对的对象。他们奉献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奉献则与此相反。他们为之奉献的整体虽高于个体，但并不外于和异于个体，而是体现了构成这一整体的每一个体的利益。所以整体不是对于个体的否定，而是对于个体的肯定。因此个体在为对象奉献的同时，又能从对象返回自身，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自己。他们奉献的过程，也就是个性发展的过程，主体性提高的过程。《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在剿匪战斗中，多次建立了出色的功绩。就是在这种无私的奉献中，他的沉着老练的气质，他的能言善辩的雄才，他的大智大勇的胆略，他的高瞻远瞩的

目光，他的赤胆忠心的品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提高，从而充分显现出一个战士丰富的个性和很强的主体性。

因此，英雄人物奉献的过程和个性发展、主体性提高的过程，并非如有人认为是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一方面，英雄人物的奉献大大促进了他们个性的发展和主体性的升华，杨子荣是这样，吴琼花、林道静等也是这样。另一方面，英雄人物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又促进他们奉献得更多和更好。杨子荣在威虎厅突遇小炉匠时，如果他没有斗志顽强的品格，没有胆识超群的智慧，没有从容不迫的心境，他是不可能出奇制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艰难、最复杂的事业，没有自觉参加这一事业的每一个体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无论经历什么样的曲折反复，之所以不可能被扼杀、被战胜，不仅在于这一伟大的事业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在于参加这一事业的每一个体的个性的极大发展和主体性的极大发挥。《林海雪原》中仅仅36人的我军剿匪小分队，为何能全歼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呢？靠的是我们战士的一以当十、十以当百的个体主体性的发挥，以及由此而构成的无坚不摧的整体的合力。

英雄人物奉献的过程，由于同时是个性的发展和主体性提高的过程，因而也是对象性的肯定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所以，奉献虽然意味着某种牺牲和艰辛，甚至意味着与亲人和战友生离死别的痛苦。但是，奉献又不仅仅是如此。因为英雄人物从奉献的对象中，看到了自己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的客观成果和客观价值，亦即看到了对象对奉献的客观肯定，因而能从对象返回自身，获得悦心怡神的审美体验。因此，奉献也就意味着进入了更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而这正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奉献和奴隶的奉献

本质区别之一。奴隶的奉献只有牺牲和痛苦的感觉，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人物的奉献，伴随着牺牲和痛苦的，是在感觉上、精神上超越牺牲和痛苦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所以，在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奉献的过程中，乐观主义精神总是伴随着不畏困难，不畏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一点，在《红岩》这一无产阶级正气歌中得到了非常生动感人的显现。

英雄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塑造的经验和问题，是一个可写若干部著作的大课题。这个课题以前不是研究得太多，而是研究得太少，特别是深入的、有独特见解的研究太少了，这和我们这样一个英雄的国度是不相称的。如果我们能以毛泽东美学思想为指针，且又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和文艺创作的实际，这种研究一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上接第90页）

综上所述，要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基础上，尽可能地正确把握文艺与政治内在的审美联系，既坚持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又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性，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美学原则。这不仅符合马列文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关于文艺科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也符合几千年人类进步文艺发展的历史。那种认为“文艺与政治不能统一”，而统一必然导致“文艺的衰败和贫困”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是违背文艺创造实践及其发展规律的。按周恩来同志的形象说法，文艺与政治的内在统一关系，就好比是两条腿走路。反对它们的统一，就是主张一条腿走路。显然，“统一”与“单一”，本来并不难理解，但是有的同志一遇到对立面的双方关系时，思想方法不对，主要是缺乏唯物辩证法，往往大谬不悟地主张一条腿走路，难免要跌跤，受到艺术辩证法的惩罚。

注释：

① 见《文学传统与作家的精神地位》一文，《文学自由谈》1988年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97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周恩来论文艺》第91、82、21、93、94、27、91、92、1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① 《鲁迅全集》第5卷第348～349页。

②③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1卷第69、282～283页。

④ 转引自《外国名作家传》上册第58页。

⑤ 转引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第85页。

⑥ 高尔基：《论文化》，转引自《文艺报》1960年第6期。

⑦ 见《文学的，非文学的》一文，《文学角》1988年第1期。

⑧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页。